

父亲王云阶的音乐人生(2) ◆ 王龙基

指挥《黄河大合唱》

为了有效地进行抗战,与日寇争夺制空权,1939年在四川成都蒲阳(今都江堰市)成立了空军幼年学校。蒋介石任校长,我父亲任音乐系主任教官,我母亲任音乐系教官。当时,空军幼年学校把应征入伍的热血青年分为一至六期,他们除了学习空军驾驶、空战技术外,还学习音乐。经过短期的培训后,就驾机与日寇进行空战,对日寇的嚣张气焰给予了有力的打击。

其中,父亲的学生周志开就是一期的学员,他也是空军英雄,曾击落日寇飞机6架。1943年12月14日,他单机出动侦察敌情,途中遭到4架敌机的偷袭,不幸于湖北长阳县被击落阵亡,时年24岁。志开牺牲后,他的母亲立即把志开的弟弟志兴送进空军幼年学校,插入第四期,弟承兄志,保家卫国。

不久,熊佛西先生率抗战剧团抵达成都后,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演出活动。后来在四川郫县新民场的吉祥寺创办了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学校,邀请我父亲和母亲担任音乐教师。

《星火吉祥寺》一书中,有关于“吉祥寺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学校沿革——钢琴教师王云阶先生与《黄河大合唱》”的记载:

熊佛西先生创办的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实验学校要聘请具有真才实学的人,云阶先生来到了郫县新场吉祥寺。这里,空气清新,可以自由呼吸,围墙不高,但很安全。他一到学校,就以热情而谦逊受到器重;他也一下子就非常迷恋这所学校,感到这学校是自己的。学校没有钢琴,他自己进城去向私人租用了一架钢琴。当时的道路是小路,只能过鸡公车,而

鸡公车无法运钢琴,师生们撑着饥肠辘辘的脊背,手推肩扛地从田间小路硬给抬回了乡下。只消看一下云阶先生那刀削般的面部棱角,便知道他是要在这里做一辈子的钢琴教师了。他向贺绿汀先生写了信,谈了自己的感受,并邀请贺先生来此共事。

当时,张季纯先生也在这里。一次,父亲在他的案桌上发现了一摞油印简谱《黄河大合唱》,父亲看后兴奋不已:“星海曲!”他回忆起两年前在武汉参加“星海歌咏队”的日子。与洗星海离别以后,父亲对这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怀念不已,今天意外地看到星海先生的大作,如睹故人。父亲如获至宝,立即组织全校师生排练《黄河大合唱》。

但是,那时入学不久的音乐科学生还没有经过正规的音乐训练,从学生的数量到能力都难以胜任演唱任务。面对这部高难度的作品,大家都不知所措。于是,父亲动员全校师生,凡是能唱歌的、会一点乐器的都组织起来,编成一支唱队、一支乐队,由父亲任指挥,朱枫林先生担任男声独唱,学生姜蝶担任女高音独唱。经过一个多月的日夜排练,终于在1940年春天,在新场场口坝子上进行了彩排式的公开演出。当时演出场面非常感人,许多农民也从四面八方赶来,有的戴着草帽,有的扛着锄头,有的还背着背篋,还有的拖儿带女赶来观看演出,俨然是抗日根据地的热闹场景。这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第一次公开演出《黄河大合唱》,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钟情于电影音乐

后来,父亲担任了《新闻怨》的作曲。影片描述一个音乐家的悲惨遭遇,因为父亲有过同样的生活经历,

所以他在作曲中倾注了真挚的感情。这部电影音乐一出来,就得到昆仑影业公司艺委会的阳翰笙、郑君里、陈鲤庭、史东山、蔡楚生和沈浮等人的称赞,受到社会舆论的一致好评。由此,父亲担任了昆仑影业公司作曲组组长。就这样,他结束了教学工作和漂泊不定的生活,开始了电影作曲和专业音乐创作的生涯。

《新闻怨》的作曲,使他长期蕴藏在心底的音乐创作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一口气为电影《万家灯火》《关不住的春光》《希望在人间》《丽人行》《乌鸦与麻雀》《三毛流浪记》《表》《母亲》等谱写了乐曲。在《三毛流浪记》中,他不仅担任作曲、指挥,而且还登上了银幕,扮演为上官玄珠母女伴奏的钢琴师的角色。

记得解放初我在北京读小学的时候,父亲在中央电影局担任音乐处处副处长,工作很忙,经常深夜才回家,但他总是抽出时间来帮助年轻的电影作曲者完成音乐创作。记得电影《小白兔》的作曲是一位很年轻的小伙子,名叫吴应炬。父亲花了很多时间给他讲解电影音乐和电影故事情节的关系,父亲还在一张很大很大的纸上画了电影故事情节和音乐起伏的双曲线图,告诉他高潮的衔接和铺垫,并帮助他完成了主要的音乐创作。然而当我看电影《小白兔》的时候,字幕上的作曲只有吴应炬一人的署名。我问父亲,为什么不署自己的名字?父亲笑笑回答道:“帮助青年人不是更重要吗?”这类事情还发生过很多。

1955年,我随父母亲从北京回到上海,父亲在上海音乐学院与丁善德、贺绿汀一起教授作曲系的课。父亲的讲课费从来没有拿回家过,都是用来资助贫困同学。记得他为

一位同学一下子配了两副艺精眼镜店的近视眼镜,比我配的眼镜贵了许多。当时我不太理解,问父亲:为什么帮同学配的眼镜比我的还要好?父亲对我说:他的眼睛近视度比你深,而且他用五线谱作曲,需要你更好的眼镜。

“牛棚”中苦学钻研

父亲曾刻过一枚“以有涯之生命,创永恒之艺术”的篆体图章,为此他奋斗了一辈子。

父亲读起书来经常忘了时间,创作起来忘了吃饭。一次,他写起“绿豆芽”(五线谱)来了劲儿,因为当时生活条件差,竟把一斤生大蒜当干粮全部吃光了,直到胃烧得疼痛难忍才发现。

1947年,父亲的生活刚刚安定下来,他就先后向谭小麟教授学“传统和声”,向丁善德教授、肖淑娟教授、冯文元先生学习巴黎音乐学院的高级和声、对位与赋格。上世纪50年代,父亲向苏联专家阿尔扎马诺夫学习复调音乐和音乐作品分析全程。为了不错过一节课,他在通宵为故事片《林则徐》录音后,第二天清晨顾不上吃早饭,就乘车从闸北赶到上海音乐学院,一直坚持学完了全课程。

50年代初,父亲担任电影《六号门》的音乐创作时,他在东北和码头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大约三个多月,把当时码头工人肩挑背扛货物时所唱的各种“号子”都记录下来,并运用到电影中去。那时,他回到北京开会,为了赶任务连家都没有回,会后又直接去了东北。我的一个弟弟王春基从出生到夭折,父亲都没有见过面。当父亲得知春基夭折后,几天都吃不下饭,但仍然坚持音乐创作。

在十年动乱中,父亲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不仅遭到了多次的批斗、抄家,被驱赶到五七干校劳动,还被关进“牛棚”数月之久。

那时,“造反派”每个月只发给他12元生活费,父亲没有任何怨言,因为他把整个身心都放在一生追求的音乐殿堂中。在此期间,父亲用空余时间钻研《和声学》和《对位法》,并写了两本足有5厘米厚的学习笔记,这两本笔记现在还保留在我的书橱中。听前辈讲,这两本学习笔记非常珍贵,因为这是他对高难度音乐理论的探索。

“文革”后期,父亲被解放,继续进行电影音乐创作。有一次冬天出差时,因为他站在大卡车的后面,在卡车转弯时摔了下来。由于他穿着厚厚的棉大衣,又被人托了一把,所以只是把右手摔断了。当时,母亲为了支持父亲的创作,把钱省下来全部给父亲,而她自己经常把辣椒拌酱油当做唯一的菜肴。

后来我问父亲,当时感觉苦吗?父亲微笑着摇摇头对我说:“不苦,因为我一直生活在我追求的音乐殿堂中。”

上世纪90年代,父亲已年逾80,还常常受心脏病的困扰,更痛苦的是患有严重的白内障,视力极弱。1991年,在庆祝“王云阶先生音乐艺术生涯六十周年”系列活动中,他创作了新作品,包括交响乐《春天》。他都是戴着眼镜并依靠放大镜那一束聚光,艰难地在细细的五线谱上标下每一个颤抖的音符,而且经常是从黎明工作到深夜,其间没有一个“休止符”。

1996年,父亲在上海逝世,享年85岁。他用毕生的努力,实践了他自己的人生格言:“活到老,学到老,知识更新思想永不老;真也好,善也好,努力探索创作才美好。”(摘自《上海滩》2015年第4期)

传奇大将陈赓

尹家民

4.构思着一个大胆计划

庶康的脑袋“轰”地一下。父亲突然宣布的消息,像是抛过来一个巨大的绳套,把他的胸部和手脚捆得死死的,胸口就像要炸裂了。他猛地挺直身子,站起来。一阵狂风把门板吹开了,咣的一声撞在门墙上。

“爹,我才13!”“13有什么关系?”父亲磕磕烟锅说。“我12你爷爷就给我成了亲,现在不是很好吗?”他盯着儿子那涨得通红的脸,声音高起来。“我已托人做了媒,过了年就要进家。我忘了告诉你,那家女子也姓陈,叫碧君,住在10里外城前乡。家里有田二百多亩,鱼塘一口,和咱家是门当户对……”

庶康耳边只有咣咣作响的门板声,哪里听得清父亲唠叨什么。直到父亲把烟荷包卷到烟杆上,说声“这门亲就这么订下了”,他才猛醒过来,浑身的血液从脚底,通过两膝到胸口,一直流向双颊,直冲脑门。他额头和鼻梁上都沁出了小汗珠。

“爹,皇帝都打倒了,你怎么还这么封建!”“这又不是咱们一家的规矩。方圆百里你去打听打听,谁家的份子不是十二三岁以上娶亲,祖传的规矩破不得!”

母亲跑进来,艰难地弯下腰,捡起皮袍子,站在庶康面前,朝丈夫白眼睛:“你不会好好好他说,动不动就举烟袋杆……”她又转过身来,把皮袍子披在庶康身上,说道:“孩子,听话。这也不是你爹一个人的主意。乡里先生说了,你爷爷病得不轻,要你娶亲才能‘冲喜’。平日你爷爷最疼你,你也最听你爷爷的话。你要孝顺,就该把那女子娶过来。”

庶康说:“妈,你不知道……”庶康,我求你,你们别再这样吵了,人家会笑话的!再说家里也该有个儿媳妇,我整日操劳,实在应付不了……”母亲说着说着流了泪。她抽泣着,替庶康扭上袍子上的扣。

父亲咆哮的威逼,母亲含泪的劝说,大树一样的祖父倒下了,听不见龙头拐杖笃地的响声,听不见解救他的咳嗽声……支持他的



只有自己。就在父母张罗婚事的时候,庶康脑子里正构思着一个大胆计划:他要逃走……

娶亲的那天,庶康咬着牙执行着自己的计划,他先躲了起来,等天快擦黑的时候,就沿一条山路往前走。走着走着,突然听到对面有人踩着泥污走过来,他仔细一认,认出是家里的放牛娃卢冬生。冬生踏着泥污追上来,央求道:“我和你一道走!”庶康停下,抹了把眼泪,“冬生,你先回去,以后给我坟坟上添几锹土。过两年,等我当了大官就回来接你,你当我的副官。”冬生默默地地点了点头,把带来的皮袍子交给庶康。庶康一把搂住冬生,刚刚止住的眼泪又像断线的珍珠一样落下。两个小伙伴在黑夜里互相抱住低声抽泣……

陈赓与卢冬生虽然是主仆关系,却亲如兄弟。卢冬生,曾用名宋明。1907年生,湖南省湘潭县史家坳人。出生于佃农家庭,后来来到陈赓家当放牛娃。冬生比他大5岁的陈赓身上,懂得了有志少年应该走的路。陈赓离家的第二年,他也离开了陈家,到湘潭一家工厂当学徒工。在那里经历了8年多牛马不如的困苦生活。1925年农历正月,卢冬生效法陈赓的行动,悄悄地跑到了衡阳,投入唐生智的湘军第四师当了兵。这个部队在第二年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参加了北伐战争。卢冬生跟随这个部队到达武汉,又见到了被派到唐生智特务营来当营长的陈赓。两人久别重逢,分外高兴。陈赓设法把卢冬生调到特务营,留在营部当副官。从此成为在同一条战壕里生死与共、并肩杀敌的战友。

1927年8月卢冬生与陈赓一道参加南昌起义,随陈赓负责政治保卫工作,保证了起义的顺利进行和新秩序的建立。后在起义部队第二十军三师六团一营当陈赓的副官,随军南下广东,曾参加会昌等战斗。起义军在潮汕(安)汕(头)地区作战失利,部队仓促撤出汕头,卢冬生照护着腿部受伤的陈赓,同部队失去了联系。他们历尽艰险,从汕头到香港,又辗转转到上海,找到了中共中央机关。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初,党中央考虑卢冬生机智勇敢,又熟悉两湖情况,便派他护送周逸群、贺龙等到湘西北组织革命武装。

31.因为我是成龙

我只能说,那个时候的他们,甚至我自己,都不够了解我自己。“硬汉”形象也分很多种,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是那种冷血气质的杀手,但我已经演惯了面对生活不屈不挠的小人物。尽管我的外在形象看起来很“硬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也可以去尝试那种人物形象。

这次接的戏叫《威龙猛探》。制作团队结实实地把我打造成了他们心中的“硬汉”。导演是James Glickenhaus,我跟他在拍摄过程中产生了很大的不愉快。中间我曾经打电话给嘉禾老板,如果这个导演不离开剧组,我就不演了。

我最不满意的是剧组只给动作戏预留了四天拍摄期,这对以动作为生的我来说简直就是开玩笑。过去在香港,只要是我能掌控制作的剧组,每一个画面都要追求完美,从最开始的套招到真正的实拍,我们都想尽一切办法让动作更漂亮更有张力,每一个细节都反复地研究,一个镜头拍摄十几遍是常事。

然而到了这里,导演却认为动作戏并不重要,而且他也不会拍。在我眼里完全无法过关的镜头,在他那里竟然一路绿灯。眼看着电影朝着不可控制的方向滑去,我却无能为力。最终我耐着性子完成了电影的拍摄,但我不认为这是一部成龙的代表作。

这部电影将在美国和亚洲两地上映,为了避免重蹈《炮弹飞车》的覆辙,我决定尽一切力量出手挽救这个局面——我要亲手制作一个与美国版本不同的亚洲版本。我请片中的部分国外主演来到香港片场,重新进行动作戏的拍摄,这一次,要完全按照成龙的风格来。我的搭档,编剧邓景生为影片新增了一些情节,为了照顾亚洲观众的喜好,还邀来当红的叶倩文饰演了其中一个角色。当然,所有美国版本里面那些少儿不宜的恶俗画面也全都被我删掉了。最终,这个版本在香港和日本获得了好评。

李小龙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都是伟大的演员,但他们不是我应该模仿或试图超越的对象。我是成龙,如果想要有一天在全世界

成功,那也只能是因为——我是成龙。

“成龙电影”形成完整而独立的风格,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武行、武术指导、男主角的不同洗礼之后,我依旧没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名堂。那段时间很沮丧,拍过的大惊都不是自己想拍的,尽管能够看出其中很明显的问题,但自己人微言轻,没有说话的机会,更没有空间去拍自己真正想拍的东西。直到有天独立制作公司的吴思远先生来找,他希望向罗维导演的公司租借我去拍新片。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意外的机会,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如果让你拍一部完全自己主导的电影,你会想拍什么呢?”吴思远开门见山地问我。我一时没答上来。过去的生经历总是让我告诉自己,你不重要,你的意见也不重要,在前辈们面前,你只有乖乖听话的份儿。沉思片刻,我把自己的想法娓娓道来:“吴先生,现在所有人都希望制造第二个李小龙,我也被迫去做了很多这样的尝试,但没有人可以成功,他已经是一个神话,不可能有人真的超越他。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干脆开辟全新的路呢?”

看得出来,吴思远对我的观点很认同。我干脆站起身,用表情和动作向他做更细致的说明:“李小龙总是把腿踢得很高,那我就把腿踢得低一些,李小龙在跟别人打斗时会大喊大叫,表现的是他的气势和愤怒,那我在打斗的时候就可以一边叫一边做鬼脸,表现的是自己有多疼。李小龙在观众心目中是超人,那我就做一个普通人。我希望去演那种小人物,他们也有很多缺点和无奈,他们不是万能的,更不是什么大侠或英雄。”

看完我的表演,吴思远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你说的没错!我们就要拍这样的电影!”

在这样的创作理念带领下,我与吴思远合作,连续拍摄了《蛇形刁手》和《醉拳》。这两部电影大获成功,有的甚至超过了李小龙电影的票房,我再也不是“票房毒药”了,一夜之间,我成了大家争相抢夺的对象,变成了票房灵药。

还没长大就老了

成龙 朱墨

